

语言经验可以改变双语者的主导语言^x

周晓林^{xx1} 玛依拉·亚克甫² 李恋敬¹ 吕建国³

(¹北京大学心理学系,北京,100871)(²新疆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乌鲁木齐,830000)

(³成都医学院应用心理学研究中心,成都,610083)

摘要

) 23 0.9 240.0 l 23 0.00007 c 23824 16.5 134l 20 18 239.9 14.8 240.9 13.5 240.8 20.1 c 242 n 234.9 17.7 m

www.cnk.in t

不熟练的双语使用者在加工第一语言时直接激活语义,而在加工第二语言的形式表征激活第一语言语义。加工第一语言的速度比加工第二语言的速度快,因而第一语言总的加工速度比第二语言运用的逐渐熟练,从形式表征的直接通路会逐渐增强,语义表征的直接通路会逐渐减少。据此推论,语言经验对第二语言的效率,但不能改变双语言之间的不对称性,“主导语言(dominant language)”的同义词。

对这个不对称模式有关的主要问题[15,20,21]。他们认为,第二语言熟练程度后,其词汇信息在加工时更容易提取,双语者从第二语言中提取词汇,第二语言变成了从属地位。虽然这种观点(如对海外留学生的观察),

但并未得到广泛接受,且缺乏实验证据。

本研究两个实验分别考察了韩语(实验一)和朝鲜语-汉语(实验二)双语者的语言内及语言间的语义启动效应。两组被试使用第二语言(即韩语)的期望语彙上有较大差异,我们希望通过考察两组内语义启动效应模式的异同来探讨“主导语言”对第二语言的影响。研究的逻辑是,如果认知加工上的“主导语言”不等于“第一语言”,那么使用第二语言的经验和语言内及语言间语义启动效应模式;如果语言经验不能改变双语之间的不对称性,则两个实验应得到类似的效应模式。应指出的是,这里所说的“语言经验”

词频统计数据。但两种语言中各有 15 名没有参加正式实验的被试对这些词作了熟悉度的主观评定(7 点量表,7 为非常熟悉,1 为完全不熟悉)。维吾尔语目标词的平均词长为 518 个字母,汉语目标词的平均频率为 37 / 百万。维吾尔语目标词的汉语相关启动词和无关启动词的平均词频分别为 80/ 百万和 36/ 百万,它们的维吾尔语相关启动词和无关启动词的平均词长都为 6 个字母,维吾尔语相关启动词、无关启动词以及目标词在熟悉性主观评定中的得分都在 513 - 516 之间。汉语目标词的汉语相关和无关启动词的平均词频分别为 40/ 百万和 62/ 百万,它们的维吾尔语相关启动词和无关启动词的平均词长分别为 517 和 612 个字母。相关和无关启动词词频没有完全匹配,是一个遗憾,但这不影响结果的可靠性(Ken Forster, 2003, 私人通讯)。这是因为在相关和无关条件下被试是对同一目标词作判断,而不是对启动词作反应,启动词频率的作用较小;再者,虽然无关启动词的词频相对较低,但它们都是常用词,频率之间的差异很小,连一倍也没有达到;而启动词和目标词之间较长的 SOA (300 ms) 也保证相关启动词和无关启动词的语义都能得到充分的激活^[22]。作为填充材料,实验还包含 40 对汉语

cnki.n

验二中,有3个朝鲜语目标词被剔除。除此外,未对原始数据作任何矫正或修剪。表1和表2分别列出了实验一(维吾尔语-汉语)和实验二(朝鲜语-汉语)被试的平均反应时和错误率。

3.1 实验一

首先对反应时数据进行 $2 \times 2 \times 2$ 的方差分析。分别以被试为随机变量进行被试检验(用 F_1 表示),以项目为随机变量进行项目检验(用 F_2 表示)。结果发现,目标词类型的主效应显著, $F_1(1, 47) = 851135, p < 01001, F_2(1, 71) = 52158 p <$

www.cnki.net

表2 实验二(朝鲜语-汉语)被试的平均反应时(ms)和错误率

		启动词						
		汉语			朝鲜语			
		语义相关	语义无关	效应	语义相关	语义无关	效应	
目标词	汉语	均值	557	611	53	613	620	6
		错误率	117	212		117	115	
	朝鲜语	均值	653	698	45	615	676	61
		错误率	819	710		713	717	

言获得的时间与语言获得环境。

从表3中可以看出,第一,从小学到中学以至大学,两组双语被试的汉语相对使用量从少到大,依次增加;而对母语的使用却刚好相反;第二,维汉双语被试的口头语言无论是在小学、中学、还是大学都是母语明显占优势;而朝汉双语被试的口头语言在大学阶段却是第二语言(汉语)占优势;第三,在阅读方面,维汉双语被试的汉语阅读经验要明显少于朝汉

双语被试;虽然在大学阶段维汉双语被试阅读汉语的概率要大于阅读母语的概率,但两者之间的差异明显小于朝汉双语被试;第四,在大学阶段,朝汉双语被试无论是在听、说方面,还是在阅读方面都是第二语言(汉语)占优势,而维汉双语被试在这两者之间却产生了分离现象。如我们下面要讨论的,这些语言经验的差异可能对语言习得产生相当大的影响。

表3 实验一、二被试各年龄阶段双语使用的相对概率(%)

		维吾尔语-汉语			朝鲜语-汉语		
		小学	中学	大学	小学	中学	大学
维吾尔语(朝鲜语)	听、说方面	94	85	70	87	76	19
	阅读方面	/	80	35	89	75	7
汉语	听、说方面	6	15	30	13	24	81
	阅读方面	/	20	65	11	25	93

从第二语言汉语的获得环境看,朝汉双语被试接触到汉语的机会和场所比维汉双语被试更为广泛。我们的40名朝汉双语被试均出生并成长于我国东北的朝鲜族家庭,从小生活在朝鲜语家庭环境中。他们在家中与父母交流一般使用朝鲜语,但是与外界交流,尤其是在学习、接受信息时更多的是使用汉语,接触到的一般传媒(如电视、报纸)也是使用汉语。其中一些被试居住在民族混杂的社区中,幼时也常与汉族小朋友一起玩耍。朝汉双语被试大都进入朝鲜族小学和中学,此时课本为朝鲜语,但是有汉语课程。进入北京的大学以后,他们进入了完全的汉语环境,同学之间交流大都使用汉语,课本几乎都是汉语,汉语成了日常使用的主导语言。当然我们也注意到,被试的汉语发音还并不完美,但这并不妨碍他们提取汉语词汇意义的速率。

实验一的实验结果表明,朝汉双语被试在提取汉语词汇意义方面表现出明显的优势,这可能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少数民族地区。他们是在与汉语

区。他是在信息本不到自维在与汉语区

都疆维吾语用

在这个模式中,母语可以启动第二语言,第二语言不能或很少启动母语。这正与实验二的结果相反。Kroll 提出的双语非对称模型认为,被试的母语(主导语言)启动第二语言要易于第二语言启动母语(主导语言),而且这两种语言共用一个概念系统;在此模型中,主导语言就是母语。据此看来,我们朝汉双语被试的主导语言应是汉语,而不是他们的母语朝鲜语。这种推论符合我们对被试的问卷调查结果。如前所说,这些被试在大学阶段使用(口头和书面)汉语的概率已远超过使用母语朝鲜语的概率。从表 2 以及统计分析可以明显看出,被试对汉语目标词的反应时要快于对朝鲜语目标词的反应时,错误率也是远低于朝鲜语。也就是说,他们加工汉语的效率远胜于加工朝鲜语的效率。

维汉双语被试的语义启动模式既不同于朝汉双语被试的模式,也不符合经典的双语语义启动模式。但我们认为,这个范式反映了维汉双语被试对汉语加工的困难,说明他们的主导语言是母语维吾尔语。从表 1 和统计分析可以得知,维汉双语被试对汉语目标词的反应时间要远长于对维吾尔语反应的时间,对汉语所犯的反应错误也多于对维吾尔语所犯的反应错误。为什么在维吾尔语作启动词时对汉语和维吾尔语目标词的启动效应要大于在汉语作启动词时的效应呢?我们的解释是,因为被试加工维吾尔语的效率要远高于加工汉语的效率,在 SOA 为 300 ms 时,被试加工维吾尔语启动词的时间比较充足,而对汉语启动词的加工则比较仓促,汉语启动词的语义没有得到充分的激活,因而它们对目标词的

equal memor

2013 2

es 487.5(e)-32.7(n)-10.7(t)-51.1(a)-21.3(t)-28.4(i)51.0(o)-67.5(n)-56.1(.)-465.0(J)-42.3(o)-56.1(u)-10.7(r)-52.9(n)12.0(a)24.1(l)-289.5(o)34.7(f)4368.9(M)3.8(e)-3

42.0(t)-85.2(r)-7.5(a)-44.0(n)-22.1(s)